

中文版序

丹尼爾·里斯

幾年前我完成《崇拜毛》一書的英文手稿時，在大多數觀察者眼中，對這位中國共產黨前主席的崇拜看上去已經消退成為歷史。對毛的崇拜僅僅被視為一段越發遙遠與離奇的過去，它的特征是對那位「我們心中最紅的紅太陽」非理性爆發的儀式崇拜和明顯不可理喻的言辭崇拜。除了流行文化中懷舊式的提及，以及在收入差距和腐敗問題越發嚴重的政治環境下仍然繼續依戀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少數毛主義頑固分子之外，崇拜毛看上去已經喪失其全部的現實相關性。

本書的寫作目的最初可以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我希望用史料還原文化大革命中崇拜毛的現象，分析這種領袖崇拜的具體形式和其出現的特定歷史背景，以便更好地理解其與當代的聯繫和在當代的傳播；另一方面，我對這種崇拜背後的結構和功能十分感興趣，這種崇拜在文革的早期曾被用作動員的方法，但是，非常矛盾的是，其在文革運動的後期卻被用作實現無條件服從的工具。對毛澤東的崇拜常常被簡單地視為基於「天命」的合法性主張，或者其他神權概念中皇帝崇拜的傳統的、精英主義的結果，或者按照文革後的說法將其視為封建「遺毒」。但通過將此種崇拜作為現代特有的統治工具（基於媒體宣傳、黨內支持網絡以及民粹主義的群眾運動）進行分析，我對崇拜毛的闡釋與以上這些說法都有着巨大的差異。這種崇拜具有雙重屬性：一是一種沉悶枯燥的正統，通過展現人格化的符號來支持黨的領袖以集中大眾情感與忠誠；二是同時呈現出的破壞性潛質，即通過「卡里斯馬式的動員」¹將領袖的媒體形

象作為動搖黨正常統治根基的資源，而這一點與關於共產黨專政的性質與穩定性的討論越發相關。

儘管我在本書的結尾留下了悲觀的評論，預測在中國未來的政治中個人崇拜的問題可能會捲土重來，但政治事件卻進行得比預測得要快得多。由於對黨領導的先鋒性的說法、在層級化的黨組織內政治交往的基本原則都沒有發生改變，對中央或地方領導人進行有組織的崇拜，一直都對黨的團結造成持續威脅。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紅色文化運動及其對文革美學和語言的懷舊，是培植民眾以期在省一級範圍內提升個人媒體形象的最顯而易見的嘗試。2012年3月薄熙來倒台的幾天前，前總理溫家寶在公開場合含糊地表示：如果黨不能實施進一步的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的動亂還會捲土重來。²但僅僅在習近平升任後不久，這位新的中央領導人再一次有意識地培育其公共形象，使這種形象在視覺上和言辭上都足以被稱為是來自中央所精心策劃的領袖崇拜。³儘管到目前為止習還沒有從根本上挑戰集體領導的觀念，但是他已經被官方稱為第五代領導「核心」，他的形象和聲望也極大地超越了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伴隨著習近平在公共安全、經濟改革和反腐鬥爭領域中越發突出的地位而出現的集中化，促使了中國政治光譜大大移向左傾的可能。而這種左傾勢力就包括不久前剛去世的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他是文革小組裏最後一個去世的），他2014年11月在香港接受《明報》採訪時表示希望習近平能夠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成為第二個毛澤東。⁴但是，據戚本禹所講，即使習只是處置腐敗的新權貴階級中的一部分，「哪怕做不到毛澤東，能趕超普京也行」，但這也絕非易事。習試圖通過「兩個不能否定」⁵的說法限制對以往歷史的批評，這又助長了那些對他繼承毛遺產特別是文革的期待。「兩個不能否定」指的是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習近平很晚才表達了他對1981年《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裏對文革官方評價的贊同，⁶此時日益接近的文革五十週年紀念日帶來了許多將習和毛相比較的言論。目前還沒有什麼

跡象表明習近平打算追隨毛澤東的革命道路，或者他為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未來遠景會依靠領袖崇拜而動搖黨的統治。習近平現今培植的領袖崇拜，看來與中國在民國時期由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人發展出來的做法如出一轍，這種崇拜曾被彭真描述為在公共符號下用來團結黨和群眾的「工具」。

但是，這種逐漸聚集到領導人身上的符號化力量在整個過程中從來就沒有被完全控制。香港媒體在2017年3月引用中辦4號文件，指出習近平希望將自己對黨的意識形態的理論貢獻精簡為「習近平思想」，在十九大時寫入黨章，從而與之前的中共領導人並列，並且對國家主席的任期有重大修訂。⁷因而，我認為對於毛崇拜的形式和功能的不只是歷史學家的興趣。儘管科技的進步已成為現實，這種崇拜所提出的主張也決定性地由「革命」的內涵轉向「民族主義」的內涵，然而這種崇拜依舊值得從當今政治制度的運作來進行考察。

如果沒有北京清華大學唐少傑教授——一位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專家——辛勤的工作和持續的鼓勵，這部書的中譯本就不會問世。他遴選了秦禾聲、高康和楊雯琦三位有能力的譯者，完成了中譯本的初稿。唐教授憑藉着他對毛崇拜中晦澀細節的了解，指導了整個翻譯過程，對翻譯工作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建議，並最終審校了譯文。我還要對閔夢晗表示感謝，她在對比中英文稿件上提供了巨大的幫助，並指出了書稿語言上的某些不足。另外，我要對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致以謝忱，感謝他們在當下艱難的政治環境下仍然同意出版《崇拜毛》的中文版，並且專業地完成了此書的製作。我衷心地希望這部書的中譯本能夠為未來有關中國毛主義個人崇拜的歷史細節和遺產的討論，以及如何構建和闡釋社會主義領袖崇拜的理論探索做出貢獻。⁸雖然到目前為止，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研究的「黃金時期」似乎暫告一個段落，但是對於本書提出的許多問題，仍然值得未來更加全面的討論和更加具有比較性的分析。

北京

2017年4月4日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版權所有

中譯者序

唐少傑

這本書的英文版 *Mao Cult: Rhetoric and Ritual in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由劍橋大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作者丹尼爾·里斯 (Daniel Leese, 1977) 博士為德國弗萊堡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系教授。據我所知，這本著作是世界上第一部評論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專著。對毛的個人崇拜是毛澤東研究領域中一個富有意義和影響力的問題，這本書的出版有力地推動及深化了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作者的專長在於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以及政治史、文化史等，他的這本著作最初是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以德文寫成的 (令人遺憾的是德文版本至今還沒有問世)，篇幅遠多於上述在劍橋大學出版社首發的英文版本。在「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且不帶引號) 爆發50週年、結束40週年來臨之際，我們翻譯了此著，頗為感慨，這不僅僅是因為在文革故鄉對於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研究和評述遠遠不夠，而且事實上，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遺蹟和作用對於今日中國來說還沒有消失或結束。

為了更好地體現出漢語表達的主謂關係，我把此書的英文原名「毛崇拜」(Mao Cult) 轉譯成「崇拜毛」，這種轉譯是為了強調「崇拜」這個行為動作，並凸顯這並不是來自毛澤東本人對毛澤東的崇拜，避免了容易望文生義的誤解。其實，在文革時期，除了對自己的權力和權威之外，毛澤東本人對於其他一切事物幾乎沒有什麼可崇拜的！

這本著作主要是從「言辭崇拜」和「儀式崇拜」這兩個方面來評述對

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問題。這兩個方面是這種崇拜的主要所在，非常有代表性地體現出了這種崇拜的諸多特性。

首先，這本著作簡潔而又透徹地評論了崇拜毛的直接由來，介紹了現代中國歷史上對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各自個人崇拜的演變，概括了對現代個人崇拜的闡釋和表現在學術研究上、在商業經營上和政黨事務上的不同旨趣。

其次，這本著作簡述了中國大陸自1956年至1964年期間對毛的個人崇拜所表現出的趨勢和特徵。作者準確地論及了1956年2月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旨在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這個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報告，不啻是對中國內地崇拜毛的一次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可以說是區分這種崇拜的新、舊時代及其形式的一個分水嶺。這份「秘密報告」促使毛澤東以及中共中央在個人崇拜問題上做出了必須的、多重的和獨特的反應，特別使毛澤東本人在對他的個人崇拜問題上幾乎陷入了進退維谷、矛盾百出而最後不斷加以推進的境地。這與毛澤東在1956年之後至1960年代初所遇到的國內國外鬥爭和黨內黨外的危機是密切聯繫的。

再則，這本著作具體評述了文革前夕，林彪及他所代表的解放軍勢力，在具體地形成崇拜毛澤東的運動、範式、方法和模式上所起的獨領風騷的作用，並從傳播學和解釋學的角度開拓了崇拜毛在信息控制和意義理解這二者之間的聯結或關聯。書中還追述了在崇拜毛的問題上，中共黨內及有關高層領導的異議或批評。作者專門用一章（第五章）概述了以「紅寶書」即《毛主席語錄》為代表的毛澤東著作在文革前夜和文革初期的編纂和出版發行情況，凸顯了崇拜毛已完全「物化」到了人們的實際生活及行為舉止之中。書中第六章則揭示了文革全面爆發之際，也就是崇拜毛達到了如日中天之時；換言之，崇拜全面鋪排之際，也就是文革如火如荼地展開之時。毛澤東本人在這兩者之間的互動中起到了或姑息或利用或輔助或推動的作用。例如，毛澤東1966年8月18日至11

月26日先後八次接見一千一百多萬紅衛兵和青年學生及群眾的活動，就是來自毛澤東本人對個人崇拜的一大獨創！

另外，這本著作概述了文革初期通過「三支兩軍」而得以大大強化的崇拜狂熱和「規範」，以諸多事例表明了崇拜毛的紀念品(物)的生產和製造直至氾濫，同時還展現出了這種崇拜有可能失控，為文革群眾運動以及文革群眾組織為己所需地利用，帶來無序地普及的危險。作者專門梳理和分析了文革初期崇拜毛所具有的表忠語言，確鑿地表明了這種語言既是組織性的，也是儀式性的，還是阿諛奉承的，更是魔幻傳奇般的。作者對這種表忠語言的剖析，再次證明了這種語言作為政治語言、工作語言和日常生活語言的混合體，彷彿成為文革這種紅彤彤的生活運動的某種「底色」。

更為出色的是，這本著作專用一章(第九章)生動而細緻地分析了崇拜毛的儀式及其物象化(如崇拜物品)的特點、流行、泛濫和傳奇等諸多方面。這些追述對於今天沒有經歷過文革的中國青年一代來說，不是天方夜譚，就是匪夷所思。從作者精彩地再現和洞察性地評價中不難看出，儘管文革中崇拜毛的儀式及其物象化烙有庸俗、荒唐、可笑直至可恥(更不用說普天之下勞民傷財了)的印記，但是這種個人崇拜及其所有形式在實質上是非常有理性和目的性的，是包含有無數私人利益的「政治表演秀」，因為無論是那些數以億計的崇拜者還是那位唯一的被崇拜者個人，都紮紮實實地把這場「政治表演秀」表演成了文革的鬧劇兼悲劇。作者進一步考察了文革中、後期和文革結束之後來自中共高層的對這種個人崇拜的抑制和某種程度的消解，特別是具體地概述了來自民間草根的思想者對這種個人崇拜的批判。

最後，這本著作的「結論」部分開創性地把對毛澤東的崇拜同20世紀一些極權主義黨國獨裁領袖的個人崇拜進行簡要比較，從政治學、宗教學、輿論傳播學等多重角度，簡要地概括了崇拜毛的功能和意義，尤其是這種崇拜對於文革本身的作用和影響，進而還表明了正如文革的幽靈在今天的中國還遠遠沒有消失，崇拜毛所帶來的巨大歷史陰影還會在

今天和未來的中國大地上映現、折射，甚至延續。

這本著作充分體現出了作者的治學功底和學術風格。它不僅在史識上有着獨特的個性和往往令人反思再三的洞見，而且史料上的取捨和運用都顯示出博採眾長的魅力和富有匠心的特色。這本著作較成功地汲取了學術界尤其是中國大陸學者關於崇拜毛的諸多研究成果，適時而又有效地把這些研究成果融入到全書的論述中。作者利用自己到河北省檔案館查閱資料的機會，查找並收集了諸多河北地區文革時期崇拜毛的文獻資料及個案材料。這些材料既有地區性、事例性的特徵，又有獨特性、典型性的特徵，到目前為止，只有作者本人第一次公開使用和展現出來，十分難得。從這本著作的紮實論述和嚴謹結構，不難看出，以作者為代表的德國學者在研究文革問題上的嚴格、求實、細緻和深刻的特點。在此，我謹向作者致以謝忱，因為在我指導我的三位學生翻譯了英文版，並且經過我個人全部校對之後，我把這份譯文稿發送給作者，作者作了細心的審讀，並且根據迄今為止只有他本人才擁有的一些中文文獻資料及檔案等等的原初記錄稿，對我們的譯文進行了核對或補充，使展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中文譯本至少有了引文質量的基本保證。所以，可以說，諳熟中文的作者也是本書中文譯本的譯、校者之一。

儘管作者本人作為外國人，年紀較輕並且不可能經歷過文革，但是他的這本著作無疑為今後探討或研究文革中崇拜毛澤東的現象和問題，做出了非常可貴的嘗試，付出了積極意義的努力。我們在這本著作的基礎上，應該繼續做下去的研究工作還有許許多多，在我看來主要有四點：

第一，這本著作基於歷史學、社會學以及文化符號學的角度來闡述文革中崇拜毛澤東的取向、特徵和表現形式等問題，這也為我們下一步深入探討這種崇拜背後的崇拜者個人或崇拜者群眾的心理壓力、精神抑制和政治恐懼等等因素提供了幫助。包括我在內，經歷過文革的人們，都不同程度地體驗過崇拜毛澤東的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活動及其形式，都多少地與文革時期空前而廣泛的內心緊張、精神恐怖和生活禁錮

息息相連，這些方面往往所表現的是：一方面，通過這種日常的、世俗化了的和功利化的崇拜活動及其言辭和儀式，人們的社會身份及政治角色直至特定的歸屬意識和相對的生活安全感，才能得以確定，才能得以維繫；另一方面，從難以計算的那些崇拜毛澤東的個人或群眾來說，他們都幾乎不約而同地把這種崇拜活動及其所有形式無以復加地實用化、工具化和極端化，所有這些都恰恰表明了文革中崇拜毛澤東現象是形式大於內容，現象重於本質，過場高於實效。這些本身都已深深地注定了崇拜毛澤東的活動乃至其所有方面的全盤危機和全面異化。簡言之，從我本人的經歷和見證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文革崇拜毛澤東實質上是文革個人和文革群眾的政治實用主義理性與政治形式主義實踐的必然所在。

第二，這本著作很好地但卻過於簡單地從宗教學的角度論及了文革崇拜毛澤東的問題，這也就使我思索下面這個問題：為什麼在中國（至少是漢族人聚集的地區）這個幾乎沒有宗教淵源和宗教傳統的國度，竟然在文革初期數年之久有數億人民置身於崇拜毛澤東的活動或迷信之中呢？即使這種崇拜的言辭和儀式彷彿都是宗教般崇拜的再現。這裏所要繼續探尋的問題：一是崇拜毛澤東的活動及其儀式與宗教崇拜有無可比性？二是在崇拜毛澤東的形形色色的表現形式當中，有哪些是宗教性的，哪些又是泛宗教性的或非宗教性的或反宗教性的？三是在一個沒有深厚的甚至是像樣的宗教精神熏陶的文化環境裏，在沒有受過宗教文化洗禮的數億人民中，崇拜毛澤東的特定活動和獨有形式與其說是過度政治化的，不如說是過度庸俗化的甚至極端政治功利化的。四是從宗教與神學的關係來看，崇拜毛澤東的問題有多少是可以或「上升」到、或歸屬為、或納入到神學的視閥而成為現代中國獨有的政治化的神學問題？五是正是由於沒有真正宗教精神的維繫和沒有切實宗教文化的支撐，崇拜毛澤東的所有方面和全部問題，從文革本身的「長時段」來看和從文革現實的「大歷史」來講，才是一時的、短命的，不足以成為整個中國大陸社會的文化主流，甚至都不能成為中共文革政治的主脈！六是崇拜

毛澤東作為某種反宗教的準宗教，其運行、嬗變、結局比起人類史上已有的其他全部崇拜（甚至比起已有的任何其他極權主義化了的個人崇拜），真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最主要的一點在於，崇拜毛澤東的活動及其形式比起其他任何崇拜，失敗得更加徹底，異化得更加全面，破碎得更加慘重！

第三，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有一個不斷演化的過程，即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50年代興起、60年代鼎盛、70年代式微、80年代近於消解的過程。如果說以1956年為界，這種個人崇拜有新、舊兩種形式，那麼這種新形式自60年代初起，就趨於準軍事化乃至軍事化。顯然，文革的發動和實施依賴兩個基本條件：一是以林彪為代表的解放軍的全力支持和投入，二是「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群眾運動的全盤實施和深入。連接和維繫這兩個條件的重要保證都離不開對毛澤東的崇拜直至迷信。就是說，不同於1960年之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甚至不同於人類已有的一切形式的個人崇拜，文革中的毛澤東崇拜具有了準軍事化的機制和軍事化的運作。無疑，在1960年之後，解放軍對崇拜毛的促動和推廣、轉換和創新所起到的作用都是獨一無二、無出其右的。而這一點也得到了毛澤東本人特定的「響應」或值得關注的「映照」。例如，毛澤東自1967年9月至1968年8月在北京先後十多次接見解放軍總計十餘萬名副團職以上的幹部，可謂把來自解放軍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斷推向了高潮！⁶實際上，毛澤東的這種接見活動與他八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都是文革崇拜毛澤東所特有的、非同小可的雙向互動。顯而易見，文革對毛澤東崇拜的興盛和衰變的過程，與解放軍在文革初期的獨特角色以及解放軍在整個文革時期跌宕起伏的過程，幾乎是相輔相成的。在文革時期，真是所謂解放軍「興」，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興」，反之，亦然。最為顯著而又最為「痛徹」的例證，就是當時「直接指揮」解放軍的「副統帥」林彪的死亡，實質上宣告了崇拜毛一全民運動的近乎全盤銷蝕或瓦解。所以，這種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具有根深蒂固的軍事化特性或特質，進而，這種崇拜所充滿的軍事化氣息和準軍事化色彩的心理內涵、

話語媒介、動員模式、傳播途徑、擴大手段、嬗變函數、裂變因子、危機結果、震盪影響等等，都非常值得探討。

第四，基於對這本著作的解讀，我個人認為，應該明確提出和反思毛澤東本人與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間關係的問題。從毛澤東1966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信和1970年12月18日與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等若干文獻資料來看，雖然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和文革中期對於這種崇拜諸多做法的態度或表態大不相同，雖然毛澤東把這種崇拜本身過多地甚至是過分地當成了文革權宜之計和黨內鬥爭策略，但是他本人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這種崇拜活動及其表現形式，根本沒有陶醉於其中。正如毛澤東確信文革崇拜他的人們分為「真的、假的和隨大流」三種人那樣，他本人恰恰把這場關係到億萬人民的、持續數年的、全國全社會浪費了無計其數的物力、財力、人力和精力的狂熱和迷信，當成了文革的機會主義的、工具主義的甚至是市儈主義的東西。無論是在1956年前後毛澤東在某種意義上把對他個人的崇拜當成維護和壯大中共黨和國家的「公器」，還是在1960年代初期以後毛澤東主要把此種崇拜當成鞏固和強化他的權力、權威和權勢的「私器」，我個人認為，在崇拜毛澤東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本人的智商以及情商都出現了分化、裂變甚至內在衝突。利用還是扼制，姑息還是終止，懲息還是轉化，默認還是否棄，自我崇拜中心化還是自我崇拜邊緣化，直至崇拜的神化還是虛化等等，都在文革之際的毛澤東那裏達到了最大的對立統一！無論如何，毛澤東在崇拜毛這個問題上，體現出了他發動和領導的文革所具有的重大而深切的「悖論」！簡言之，文革期間崇拜毛澤東所帶來的全部現象、取向、問題和影響，都是毛澤東根深蒂固的文革政治的某種「宿命」！

令人可喜的是，這本著作已經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反響。²對於這種反響，很有說服力的恰恰是它來自於沒有經過文革歷史而對文革有着更高的理性把握和批判審視的年輕學者。我們在期望作者有更多更新研究中國現代歷史和政治特別是研究文革的佳作問世的同時，更加期望有更多的中國青年學者研究「毛澤東現象」或毛澤東問題的力作問世。毋

庸置疑，如何認識和評價「毛澤東現象」或毛澤東問題，已是今天和未來的中國如何自我變革、自我轉換和自我創造的一個組成部分。

值此中譯本付梓問世之際，我非常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甘琦女士和編輯葉敏磊女士、林驍女士，正是由於她們不辭辛苦，鼎力襄助，我們的譯作才有可能在切實反思文革故鄉是否真正告別文革的背景之下，對於人們研究包括崇拜毛澤東在內的文化問題有所幫助。還應致以崇高敬意的是，經過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同仁們長期艱苦不懈的努力，該出版社近些年來出版發行的一系列回憶或反思文革的著作，開拓了文革研究的路向，促進了文革研究的事業。

北京 清華園 新齋
2016年晚秋